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

——从存在哲学视域看《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冲突”

王凤仙

【提要】文学文本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的文本非常少见，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则是一个典型。作为表现对象的“冲突”纠缠在亲人、爱人、同伴、朋友之间。作家在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人与人相互“注视”，冲突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路翎对人与人本质关系的思考正与西方存在主义相通。

【关键词】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 自由 注视 冲突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1) 04-0097-05

海德格尔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生在世是“在世界中的存在”，是同世界浑然无可分离的“共在”。人在世界中存在，“烦”（sorge）是人生在世之本，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海氏的“烦”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人对某个确定事情、确定事物、确定人的烦，而是存在论意义的概念，是人现身于世的关系状态。“烦”又包括烦神（Fursorge）与烦忙（Besorge），人与人发生关系的状态叫做“烦神”。人现身于世便陷入“烦神”之中，总是与他人纠缠在一起而不得超越。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从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阐述了人与人的关系状态。萨特的“自由哲学”则在存在本体论视域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冲突”是人与人的关系本质。萨特认为人有绝对的自由，“人即自由”，但人又无法离开他人存在，正因为有了他人的参照，人才有了自我。自我离不开他人，同时自我与他人又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因为他人的“注视”^①使我生长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剥夺了我的自由，同时我也作为他人“注视”别人，在“注视”别人的同时，也剥夺着别人的自由。这意味着我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总处于对立之中，人与他人的关系注定是冲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主义哲

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海德格尔的“烦神”与萨特的“冲突”，都是对人之在世关系的阐释。

人之在世关系的本质状态是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以下简称《财》）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在文学文本中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但文学文本中的冲突往往是为表现某一人物、某一性格、某一主题，而把人与人的“冲突”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的文本则非常少见，《财主底儿女们》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文本。《财》中的冲突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实层面上的冲突，一类是意识自由层面上的冲突。后者与现实利益、文化道德无关，是作家表现的对象，也是本文分析研究的对象。

《财》中，人与他人的相互“注视”与冲突，首先

* 本文研究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资助。

① 萨特自由哲学中的概念，“注视”不同于知觉层面上的看，“注视”与“被注视”者的意识相关。

表现在爱人们之间的较量与争斗中。萨特有名言：“爱便是冲突。”自由哲学层面上，爱实质是对他人及其自由占有的谋划，爱的双方都以自己主体性的自由侵占对方的主体性自由，于是，爱就是相互的摄取与占有，就是冲突。小说一开篇，主要人物就在较量与冲突中现身。蒋少祖与王桂英相爱，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结合，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两人之间的心理较量。蒋少祖爱王桂英，但他容不了王桂英的倔强，王桂英爱蒋少祖，但她容不了蒋少祖的征服。他们有深层的碰撞与洞察，所以相互吸引，他们又个个独立，所以相互傲视不服。文本中多处细节展现着两人之间的嫉妒、冲突与征服，如，蒋少祖接到王桂英的信，虽然心里激动却决定不回应，并为这不回应所带来的心理优越感到快乐；王桂英在人群中激情演说，蒋少祖对她产生莫名的仇恨，而当王桂英羞辱地走下岗台，他的仇恨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因王桂英的落寞而心生的喜悦等等。在相互征服的较量中，一方或超越对方，或被对方超越。“从王桂英底眼光和面容，蒋少祖觉得她已被他征服。这个胜利是他所希望的，但同时他体会到深刻的苦恼。他不能明白自己底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较量不为现实功利，只是为较量而较量，这种无缘由的较量正是自由本体意义上的冲突。蒋少祖与妻子陈景惠之间，起初是暗中较量，随着陈景惠的成熟，这种潜流浮出地表。陈景惠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冰冷的意志和花言巧语是同时使用着”。她介入丈夫的社会活动，与丈夫出双入对，“朋友们都觉得，蒋少祖是太不能明白他底太太在事业上的价值了；但蒋少祖觉得，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明白她在家庭里的价值，即给他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安的、苦恼的世界。”和谐只是角色的配合，而在内心深处，两人自始至终缠绕着虚伪、嘲讽与猜疑。他们时而相互仇恨，时而相互嫉妒，时而相互厌恶，时而相互慰藉，表面上是个性、情感的纠缠，其本质则是自由层面上的相互干涉，相互占有。《红楼梦》中贾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之间的冲突是为了表现各自不同的性格，《家》中觉新与梅、瑞珏之间的纠缠是为了表现封建家长的专制，而贯穿在蒋少祖、王桂英、陈景惠之间的纠缠与冲突不是指向人物性格与文化道德，而是作为被表现的对象指向存在层面上的人之在世关系。人与人的纠缠与冲突及其所带来的桎梏感正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存在体验。在这一层面，我们就不难理解蒋少祖即将面对孩子时的心理：“在回来的路上，蒋少祖想到，在家里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新生的婴儿，认为这又是一种枷锁，心情冷酷起

来。”“蒋少祖渴望休息，但想到家里现在不可能有休息——她，那个小孩，出生了没有呢？——感到恼怒。”小孩出生，他便会进入父子关系之中，在他成为父亲的同时，他的自由也被孩子占有。因而孩子一出世，父子主体性之间便会产生对立冲突。这是一种超越人伦道德的非善非恶的存在体验。《财》中的爱人亲人之间大多充斥着这种纠缠与冲突，蒋纯祖爱万同华，同时又因着自我主体性的自由而排拒她，正如萨特一样，他要的是各自独立的伴侣，而不是婚姻；善良柔弱的蒋淑华与王卓伦生活上同甘共苦，而内心深处却是冲突不断。王桂英说，“我是为我自己生活的”，蒋少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底意义”，汪卓伦说，“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这里的“自己”不是道德层面上的自私，而是主体性自由意义上的“自我”。正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每个人都自由地“注视”他人，而且在自由“注视”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自由地“注视”，在相互自由的“注视”中，双方的自由又被限制，我与他人之间就注定产生冲突。

在对人与人纠缠与冲突的表现中，蒋蔚祖与金素痕在非常态下的追逐具有着形而上的意味。父亲把蒋蔚祖锁在苏州，他逃到妻子那里，妻子也把他锁了起来：“好像她是为了爱情而锁上他；因为老人是为了爱情而锁上他的。于是，发疯的蒋蔚祖从这一把锁逃进另一把锁。”父亲在爱他的同时也剥夺了他的自由，妻子在占有他的同时也剥夺了他的自由。这里的锁是实指，也是象征。在被占有、被干涉的同时，蒋蔚祖又本能地抗争着。被妻子锁住后，他梦见了苏州，醒来“窗上有安详的微光，近处有嘹亮的鸡鸣。”然而，“嘹亮的鸡鸣”并非一派祥和的镜像，在蒋蔚祖的感觉里，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他觉得鸡鸣是一队矮小的兵士所吹的喇叭”。传统文化中，鸡鸣是宁静祥和、安居乐业的象征，如“雨里鸡鸣一两家”“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而在这里，鸡鸣是“兵士所吹的喇叭”，让人想到的是争斗与厮杀。这个特殊意象在蔚祖出逃前后多次出现，象征人之在世的冲突与争斗。金素痕曾经认为她与蒋蔚祖除了家庭和财产是毫无关联的，但蒋蔚祖从她这里逃走以后，她痛苦而惶惑，深感到“她和蒋蔚祖之间的无穷的、深刻的缔结”。她希望蒋蔚祖归来和她好好过日子。但金素痕的真诚愿望，唤起的是丈夫的猜疑，“以后的日子，是她底追求，和蒋蔚祖底辛辣的逃亡。”蒋蔚祖逃到了他自建的巢穴里做起了“人间王者”。金素痕为使他走出那阴暗的巢穴，一次次努力，而又一次次失败。“颓唐的金素痕又开始了放纵，然而，无论怎样，

她总无法忘记她底孩子和这个苍白的、狂热的、忧郁的蒋蔚祖。……这个苍白的、狂热的、忧郁的蒋蔚祖对这个辛辣而自私的金素痕就变成了蛊惑的恶魔，并且变成了心灵底阴惨的控制者了。”蒋蔚祖与金素痕“如地狱的幽灵似地互相纠缠着”，作家把他们之间痛苦的追逐写得惊心动魄。金素痕想通过哀求使蒋蔚祖醒转，她集结所有的悲哀向蔚祖发出呼唤，“她叫唤着，悲哀地摇着头。……真实的悲痛是：混乱、焦急，感不到蒋蔚祖底生命，得不到心灵底深刻的和谐，在这个瞬间，她发觉了自己多日以来并未感到蒋蔚祖底生命。”蒋蔚祖怀疑、淡漠，“警戒着自己不要受骗”。当妻子哭诉内心真实的创痛时，两颗心似乎开始走进，但随后又立即逃开：“在金素痕底混乱的、徒然的、热恋般的悲诉和哄骗里，蒋蔚祖底妒嫉的心转向了他自己底道路，得到了防御。”在“疯人底冷酷”和金素痕的“悲悔、哭泣、咒骂、哄骗、爱抚”中两人相互追逐。金素痕虚伪而又真实，蒋蔚祖疯狂而又自知。他们之间“不是黑暗的迷乱，便是绝望的空虚”，永远无法走近，但又不能撇开关联。蒋蔚祖自杀前，报复地把自己的“鬼影”留给金素痕。他死了，但他的“鬼影”一直纠缠着活着的金素痕。萨特在戏剧《禁闭》中虚构鬼的故事揭示：人永远无法摆脱与他人的冲突，蒋蔚祖夫妻在理性与非理性交织中的相互“注视”与追逐，同样寓示着人与人永远冲突的关系处境。

二

《财》下部笼罩在“旷野”这个大意象中，人与他人的冲突关系在旷野中被放大与凸显。

小说下部开篇有这样一个细节：流浪南京街头的蒋纯祖看到街上一个士兵吃了面饼没给钱，而且打那个要钱的小贩，接着他看见另一个兵士替那个行凶的家伙付了钱，阴沉离去。之后，这两个兵在他脑中反复出现。作家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两个兵的行径引发的思考：“那个矮小的兵底给钱，并不是一种善行；而那粗暴的兵士底行凶，并不是一种恶行……人类底情操，是变动得像江南平原上的战争一样快。或者说，人类底情操，是不变的：罪恶和善良总是那么多，而一切都倾向利己，在毁灭中便倾向残酷。”这是超越善恶道德的判断，是存在意义上的质询。不管“矮小的兵底给钱”还是“粗暴的兵士底行凶”都是出于自我主体性的自由，对小贩主体性自由的干涉。因而从自由本体意义上讲，他们“都倾向利己”。这种存

在之思正与鲁迅相通，鲁迅《过客》中的过客拒绝小女孩的布施，正是为了摆脱他人对自己主体性自由的干涉。穿越善恶层面，给钱的兵和行凶的兵都同样“奴役”着他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纯祖认为“一切人都是可怕的，自己也是可怕的；一切善良，像一切恶意一样，是可怕的。”他人“注视”自己，自己也“注视”他人，“恶意”干涉着别人的自由，“善良”也干涉着别人的自由，都是可怕的。他也想到大姐的关爱：“他想到，蒋淑珍底慈祥与爱护，不但丝毫不能影响他底命运，并且徒然地增加他底苦恼，……所以，对于他，不是善行也不是罪恶。”作家通过蒋纯祖超越世俗道德的思考，在存在本体意义上探寻着人与人的本质关系。

人与人的相互“注视”、相互干涉，在旷野的现实中表现为人与人的相互较量、戒备与残杀。石华贵决定击倒强奸民女的低级军官，因为他“不能容许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强者的”，在两人的枪弹对峙中，另外的注视者朱谷良消灭了他们中的强势者——低级军官，同时在对石华贵骄傲的凝视中，“征服了他感情上的仇敌”。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其实质却是“含着一种英雄的阴谋”，朱谷良“是因了自身底骄傲的感情，而无视了别人底生命”。对于朱谷良的解救，石华贵有感激，但正如《过客》中的过客所想“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处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接受了朱谷良的解救之恩，主体性自由被压制的石华贵便一心希望朱谷良的消亡。两人暗中较劲，各自控制身边力量较弱者。这些较弱者，各自恐惧并反抗着，以自己的方式在二者之间周旋。后来丁兴旺的遭遇又在旷野中引发一场“光荣”的残杀。李荣光被枪杀，团长的两个兵士被炸碎。朱谷良、石华贵与团长枪支相对。团长的枪内并没有子弹，但他心中却有“无限的权利”。他毫不思索地向朱谷良们下达命令，朱谷良却对峙着，“这个军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同样的神圣和“大的骄傲”使朱谷良在团长第三次命令他放下枪的时候，扣动了自己手中的枪。团长惨痛地倒下，朱谷良在较量中“实现了自己的人格”。之后，旷野中的两个强者朱谷良与石华贵展开了决斗。同伴们怯懦地站在旁边，目睹自己朋友的灭亡，“而本能地庆幸自己底平安”。如果朱谷良肯屈服石华贵的话，他可以不死。但朱谷良临死前仍“冷冷地注视他底敌人”。朱谷良和石华贵肉体与精神的搏斗，是《财》中又一惊心动魄的场面。朱谷良死后，蒋纯祖为自己的怯懦感到耻辱、不

安,决定为朱谷良复仇。他手无寸铁,却利用其他三人对石华贵的恐惧与仇恨,设计圈套,引导丘根固炸死了石华贵。蒋纯祖的复仇表面看是为正义为朋友,但归根到底还是为自己。在他对自己怯懦罪恶的自责里,石华贵就是他的敌人,只有在石华贵的死亡里他才能赎罪,才能获得自由。强悍的石华贵以为消除了朱谷良,他就没有了对手,而他在消灭对手的同时,又把自己置身在另一种冲突关系之中。“当我试图摆脱他人的时候,他人也试图奴役我。……冲突是为他人存在的根本意义。”^①人生于世每个人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中,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又干涉着别人的自由,人与人纠缠冲突着,谁也无法超脱。

小说还特别写到兵士丁兴旺的死。丁兴旺很明白,在目前这群人中自己是被当做一个牺牲者,所以他不加入任何一方。但当他独自走在旷野时,一个年老女人看见他突然转身逃跑,他蓦然感到了权威,认为这老女人的逃跑是对他尊严的触犯,“在这种意识下,这个软弱的青年便明白了他底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企图尝试一下那种权威了。特别是弱小的人们,由于生存的渴望——没有这种权威,人们是感不到自己底生存的——喜欢欺凌那些比自己更为弱小的人们。”但在与老女人的较量中,他被她的一块钱制服,等他醒转过来,羞愧成怒。在他追赶老女人的时候,两个荷枪的兵士和军官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位军官是一位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团长,“在目前的这一片旷野中,他感到他就是主人。在精神上,他是有着无限的正义,无限的权力。”这“无限的正义”和“无限的权力”使他下了枪决丁兴旺的命令。老女人恐怖、自责,她没想到只是一块钱,让一个年轻人送了命。其实送掉人性命的不是一块钱,而是干涉他人的权威。这里的权威即是个人自由对他人自由的控制。作家特别解释,“没有这种权威,人们是感不到自己底生存的”,也就是说,存在与冲突共在,不可分离。丁兴旺的权威碰上军官的权威,军官的权威剥夺了丁兴旺的权威。丁兴旺的死,不是善与恶、正与邪较量的结果,而是根源于存在本体意义上人对他人自由的征服,正如萨特所言,“人要么超越他人,要么被他人所超越;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同生存,而是相互冲突。”^②

作家把人放在远离尘世的旷野,剥去层层秩序和文化道德的外衣,拷问人与人关系的本质真实。群体中每个人的存在都离不开他人,同时每个人的存在也都干扰着他人的存在。旷野里,各种算计、较量、嫉妒、猜疑、戒备、结集等冲突被赤裸裸地展示与凸

显。那许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权威,就是人与他人冲突的显著标志。一路的流血和死亡,表面上是善与恶的较量,实则是存在本体意义上人与他人自由主体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伦理悲剧,而是存在悲剧。旷野中这群亡命之徒的冲突,正是人之在世关系状态的具象化缩影。

三

人与他人的冲突在朋友关系中体现为相互渴望与敌对的特殊状态。“朋友”一词,让我们想到深情厚谊、情深意长、莫逆之交,文学中描绘友谊的诗篇名作数不胜数,这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精神情感。而路翎对朋友的书写依然予以存在层面上的观照。

同样的对权威和虚荣的厌倦,以及“那种叫做理想的东西”,使孙松鹤与蒋纯祖走到一起。他们互相理解各自的痛苦,共同追求一种个性、本真的生命存在状态。但正因为各自对存在自由的追求,两人又都遭遇着彼此的冲突,“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于是友情变成敌意。”但这又是怎样的敌对与冲突啊,蒋纯祖“为了使他底朋友经历到最可怖的痛苦,他想他将冷酷地死去,为了使他底朋友痛苦。”他们敌对着,却又无法分离,存在自由所带来的冲突与精神情感的相互渴求纠缠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关系已与道义上的朋友有了本质的区别。我们看两人的关系状态:

他们常常很多天不说一句话,他们确信他们知道对方在想着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想什么。他们对对方底眼光,动作感到厌恶。

站在内心底优越上,他同情孙松鹤。……孙松鹤无法同情蒋纯祖,因为蒋纯祖自己已经同情了,他只需要赞美。就是这样,蒋纯祖升到优越的地位上来了——他自己觉得是如此。

孙松鹤异常的谦逊,常常使蒋纯祖惶惑。……他底雄辩的才能和动人的、深邃的思想力,常使孙松鹤困恼。

他们因为各自的自由而相互冲突,又因为各自的孤独而相互需求,这对朋友即排斥着又纠缠着。冲突时,他们相互敌对,孤独时,他们彼此渴望。

文本中有一细节,集中凸显了两人间的渴望与冲突。因为蒋纯祖所不了解的内心痛苦,孙松鹤带着冰

^① 何怀宏:《生命与自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② 萨特:《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2页。

冷的感情回到面粉厂，可是孤独又使他渴望朋友，“突然他心里有强烈的渴望：他渴望蒋纯祖来看他。这种渴望是这样的强，以致于他觉得蒋纯祖已经来了。”但蒋纯祖没来，晚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人们为对女子的爱情做过这样的奔跑，现在是，在孤独的、痛苦的生活里，孙松鹤为友情而在暴风雨中奔跑。”好似心有灵犀，之前还与朋友较量的蒋纯祖，在这孤独的雨夜也向朋友走来，“闪电照见一个人影在坡顶上出现，停留了半秒钟或是一秒钟，迅速地奔了下来。这是蒋纯祖。孙松鹤大声地喊叫起来，冲上去，抓住了蒋纯祖底手。”孙松鹤用力地握住蒋纯祖的手，留下了眼泪。但两人平静之后，接着又是冷淡，新的孤独，新的较量，“常常的，在痛苦的生活里，每个人都苦斗着，他们中间一个压倒了另一个。”虽然他们相互渴望但又是两个自我中心，渴望是双方彼此的占有，排斥是双方各自对被占有的反抗。无论是渴望与排斥都来自两人之间的相互“注视”，根源于他们各自的主体性自由。

蒋纯祖与孙松鹤从乡场逃出后，也有过一段亡命之旅，与旷野中的逃亡不同的是，两人作为好朋友，没有了相互之间的戒备。逃亡中，他们相互坦白，无所不谈。然而，一旦两人从话语世界抽身而回到各自当下的存在，他们又进入冲突的关系之中，“到了可以希望将来的现在，他们相互之间就就有了仇恨的情绪。”蒋纯祖又开始轻视被他敬畏过的孙松鹤，孙松鹤又感觉到蒋纯祖的傲慢与威胁。“和外面的那个世界一发生联系，他们就各自地希望着自己底将来；在蒋纯祖心里，英雄的热情开始蠢动了；在孙松鹤心里，形成了对蒋纯祖底尖锐的敌意；他相信，这个自私的家伙，一有了出路，就会立刻抛弃他。孙松鹤是隐隐地觉察到了这个蒋纯祖在世界上对他的威胁的。特别痛苦的是，他觉得蒋纯祖是好人：他始终无法用一个确定的观念范围他。”道德价值判断中，蒋纯祖

是个好人。“自私”不是道德概念，而是自由意义上的“自我”。蒋纯祖的“自我”，威胁着孙松鹤的“自我”，两人之间充斥着轻视、敬畏、傲慢、威胁。这种朋友关系的书写在现代文学中极为少见。它穿透道德情感层面，呈现出存在本体意义上人与他人关系的本质，不包含任何是非价值判断。与其说作家在写朋友间的友谊，不如说是借朋友这个特殊的关系载体，表现人与他人的本质关系。

作家对姐弟情谊的描绘也常常超越伦理范畴。只有在存在论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蒋淑珍对蒋纯祖的关爱，为什么在蒋纯祖看来却是可怕的：“蒋纯祖，一直敬爱着这个姐姐，觉得她是焕发着慈爱的光辉，觉得她是旧社会底最美、最动人的遗留。但现在突然地觉得她可怕，比胡德芳可怕，比蒋少祖可怕，比一切都可怕。可怕的是她底仁慈和冷静，可怕的是，假如和她冲突，便必会受到良心底惩罚——可怕的是，她虽然没有力量反对什么，但在目前的生活里，他，蒋纯祖，必须依赖她。”在情感层面，他爱自己的大姐，但在自由层面，他又感到大姐的可怕。因为大姐时时刻刻“注视”着他，大姐的爱不动声色地剥夺着他的自由。姐弟情谊的背后，是自由主体间的对立与冲突。

个体意识间的冲突在《财》中随处可见，或隐或现。或表现为仇恨，或表现为关爱，或无爱憎表征，只是获得一种心理优势。这种人与人之间无关乎现实利益及文化道德的大冲突、小较量贯穿文本的始终。作家在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人与他人相互“注视”，冲突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路翎对人与人的本质关系的思考正与西方存在主义相通。

本文作者：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学院文学研究所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马光

Everyone is for Himself

—Conflicts of *The Children of the Moneybags* from the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s Perspective

Wang Fengxian

Abstract: In literary works, it is uncommon that the conflict itself among human beings is taken as a creation theme. But Lu Ling's *The Children of the Moneybags* is a typical one. Various conflicts flooded in the families, lovers, companions and friends. In the physical reality, the writer constructed a meta-physical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ne is intertwined with others, and conflict i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Lu Ling's conclusion is interlinked with western existentialism.

Key words: Lu Ling; *The Children of the Moneybags*; freedom; look; conflict